

“群学”视角下的严复教育观及其当代价值

杨 玲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市, 4001120)

摘要: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其教育思想深深植根于民族危机与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之中。在“群学”视角下, 严复提出“合群保种”为教育救国的核心要义, 强调通过教育强化民族凝聚力, 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延续与振兴。他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积弱的根源在于国民“民力”、“民智”、“民德”的不足, 并提出以“三民”为核心的教育体系来全面提升国民素养。在这一体系中, 实业教育被赋予关键地位。严复认为实业教育将科学和生产结合, 增强社会财富积累, 重塑国民理性思维与公共精神, 进而实现“厚民生”与“保国种”。这一思想不仅回应了晚清的危机, 也为今日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严复, “群学”, 教育观, “三民”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 教育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严复作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 其教育观念集中体现了民族危机感与现代化追求的结合。在他看来, 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与人才选拔的手段, 更是民族存亡与社会重建的根本性工程。以“群学”为理论资源, 严复提出“合群保种”作为教育救国的核心命题, 认为中国之所以陷入积弱危亡的境地, 根源在于国民缺乏群体意识与合作精神, 导致社会内部凝聚力不足。鉴于此, 严复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便是通过启蒙与训练, 培育国民的合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以此来保障民族的延续和国家的独立。因此, 他提出以“民力”、“民智”、“民德”为核心的教育体系, 旨在全面提升国民素质, 重塑社会活力。在这一体系中, 实业教育被赋予至关重要的地位。他强调, 教育必须与科学、生产和社会需求相结合, 通过培养掌握现代技能与实践能力的劳动者, 既改善民生、厚实国力, 又能锻造具有理性精神和公共德性的现代公民。这种教育模式不仅直接回应了晚清中国的危机, 更为国家走向富强与民族振兴提供了可行路径。

一、合群保种：严复教育救国思想的核心要义

严复的教育思想主张与近代中国危亡处境息息相关, 其中“合群保种”是其教育救国理念的核心命题。严复认为, 近代中国积弱的根源在于国人缺乏合群精神, 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组织力量。他以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为思想资源, 提出必须通过教育提升国民的群体意识与社会合作能力, 以“合群”之道强化民族凝聚力, 从而实现“保种”, 确保中华民族在列强竞争中不致灭亡。这一逻辑成为严复教育救国思想的核心命题。在演化论的影响下, 严复认为晚清社会政治的困境体现在国家竞存过程中的弱势地位, 表现为“种与种争, 及其成群成国, 则群与群争, 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 愚者当为智役焉”;^①但

本文系 202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严复‘群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 20XJC840003)资助的研究成果。

杨玲, 女, 讲师, 社会学博士,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现就职于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① 严复:《原强》, 王栻编:《严复集》第 1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年, 第 5 页。

是其根本原因在“国民程度”，即“民力”、“民智”、“民德”，他指出近代中国陷入存亡危机的境地正是源于“民力已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①严复分析国民程度低下是阻碍社会演进、致使中国群体内部疏离的根本原因，他指出这种疏离状况渗透在百姓日常的微观生活当中并具体表现为国民的普遍冷漠，他说：

“夫离心力者，非权臣内奸，外藩跋扈，士民朋党，大盗移国之谓也……然则离心力之情状何如？其情状之可见者，朝野又安，除外侮之外，晏然无事，野无盗贼，即偶有，亦旋擒搜荡平之。士林无横议，布帛菽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缛，踰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夫中国之不可救也，不在大端，而在细事，不在显见，而在隐微……此病中于古初，发于今日，积之既久，疗之实难。无以名之，名之曰离心力而已。”^②

对此，严复感慨道：“夫今日中国之事，其可谓太息流涕者，亦已多矣。而人心涣散，各顾己私，无护念同种忠君爱国之诚，最可哀痛。”^③在严复看来，外侮的强势，国民的疏离，如此发展下去的话，将是“其种愈下，其存弥难”，势必“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④严复进一步指出造成中国羸弱的“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国人之暗，人才之乏为最重……财匮民穷，欲政府为根本救济之法，殆无其术，何则？观其举措，彼方戚戚以断炊破产为忧，刻意聚敛，以养军为最急之事，尚何能为民治生计乎？教育强国根本，而革命以后，所谓不特弹无，听亦无矣。”^⑤严复认为正是旧式的教育制度抑制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他指出：“中国教育，不过识字读书；识字读书不过为修饰文词之用；而其修饰文词，又不过一朝为禽犊之兽，以猎取富贵功名。”^⑥也就是说传统儒学及其科举制度下的学术取向偏重义理的阐释、典籍的考据、辞章的修辞，强调的是道德教化、经义阐发和文字技巧。这类学问在维系传统社会礼制与伦理有其价值，但因其脱离现实生产与制度建设，难以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财富积累。长此以往，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足，最后引发人与人的生存争端，进而造成“散群”、“群涣”的局面。

因此，严复认为：“中国今日自救之术，固当以事业教育为最急之务。何则？惟此乃有救贫之实功，而国之利源，乃有以日开，而人人有自食其力之能事。语曰既富方穀，又曰仓廩实而后知礼仪，兵力教化，何一非富足而后可言乎！”^⑦在他看来，教育应当着眼于普通民众的生计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正因为如此，他尤其提倡实业教育，强调“于以生财成器，前民用而厚民生者”。^⑧他认为当教育直接作用于生产与生活，才能真正改善民生福祉，增进社会财富积累，推动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可见，严复心目中的实业教育是一种关乎国家存

^① 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页。

^② 严复：《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王栻编：《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5页。

^③ 严复：《拟上皇帝书》，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3页。

^④ 严复：《天演论》，王栻编：《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31-1333页。

^⑤ 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四》，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23-624页。

^⑥ 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王栻编：《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页。

^⑦ 严复：《实业教育——侯官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说》，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4页。

^⑧ 严复：《实业教育——侯官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说》，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3页。

亡和社会文化重建的根本举措。通过实业教育，民众可以形成勤勉、守信、合作的品格，社会亦能因生产力与民德的同步提升而走向良性发展。这意味着，严复所设想的实业教育，不只是技术教育的层面，而是以科学方法为根基的社会改造工程，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厚民生”来“保国种”，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延续。

二、“三民”教育理论体系：民力、民智、民德

严复的教育救国思想围绕“群”展开，但是其具体的实施的讨论与策略则是落在构成“群”的“民”上。他强调民族存亡、国家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国民身体素质的强盛、理智的发达，以及德行仁义的健全，并指出西方探究社会政治治理的知识分子，都是以民力、民智、民德这三者来判断一个民族国家的高下。他说：

“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①

因此，针对清末现实危机和合群保种的需求，严复提出以“三民”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即通过“潜智慧”、“练体力”、“厉德行”来全面重塑国民的整体素养。

从“民力”方面来看，民力是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基础。严复分析指出旧式制度和礼俗对国民身心的过度束缚是导致“民力无由于奋”^②的原因，“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此中国朝野诸公所谓至难变者也。”^③因此，要提升民力则必须制度变革和礼俗改良这两个方面入手，在制度层面，他主张借鉴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强调立法来保障社会竞争的公平性，倡导以工商业立国，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与市场规则，从而促进财富的生产、积累与国民生产力的提升；在礼俗层面，他强调通过实业教育和社会实践来改造风俗，促使国民在生产与合作的过程中自觉养成互利、互惠、互助的良好习惯。由此来看，严复的“民力”其实比国民身体素质本身更宽泛，还涉及到整体社会的经济积累与生产能力。

从“民智”方面来看，民智是“富强之原”，是国强民富的根基。严复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正是其“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④在他看来西学之所以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在于其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更重要的是，国民民智的普遍提升，也是良好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基础。他指出“盖泰西言治之家，皆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⑤相比之下，严复批评中国传统八股取士之学的弊病在于禁锢个体智识的发展，进而阻碍社会整体理性思考与创造能力，致使国人难以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厘清是与非，他说“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⑥他指出八股通过限制国民智慧、败坏人心、培养无用之才，全面阻碍了民族的富强之路，“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才……其大害三：其一害曰锢智慧……从此天下事来，吾以半部《论语》治之足矣……其二害曰坏心术……苟利一

^① 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页。

^② 严复：《原强》，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页。

^③ 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页。

^④ 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页。

^⑤ 严复：《天演论》，王栻编：《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39-1340页。

^⑥ 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页。

身而已矣，遑恤民生国计也哉……其三害曰滋游手”。^①因此，他强调重实学，开民智，主张引进西方科学与思维方式，改革人才选拔的制度，“是故欲开民智，非将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②

从“民德”层面来说，“民德”不仅关乎国民的个人修养，更关乎政治社会的凝聚力。严复感慨中国社会“最病者，则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底物，爱国为何语，遂使泰西诸邦，群呼支那为苦力之国。何则？终身勤动，其所恤者，舍一私而外无余物也。”^③他进一步分析道：“古人以言利为污，而生又不能无以养，则何若取其物而深言之，使各得其分而无不平乎？况至今日国势之治安，民风之肆好，及吾一身一家所以为事畜教养者，将惟其财。”^④这正是“民德之所以迷惑而多败”的诱因，^⑤致使华风之敝“始于作伪，终于无耻。”^⑥基于此，严复进而将“怙私”的根源归结为“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⑦正是个体的自然本性受到过度束缚，导致极端自我主义，在社会交往上表现为相欺相侵，“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两无所损而利焉，然后为大利也”。^⑧因此，“民之所以为仁若登，为不仁若崩，而治化之所难进者，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⑨严复认为群己整合的先决在于如何将个体的利益和欲望合法化，从而将个体引向彼此互利互赖当中。他指出要提升民德，关键在于转化传统伦理与群体意识，使个体私德上升为公共精神，为此，严复认为提升民德的关键在于转化传统伦理与群体意识，使个体德行上升为公共精神。其中以教育与制度变革来培育国民的公德心，重视实学教育，使民众具备理性与自律的良好品质，引导个体将个人私利和群体利益相结合，最终培养真正的公德。

三、实业教育：合群保种的实现路径

在严复看来，“合群”的实现首要依赖教育体系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而实业教育正是这种对接的关键。实业教育不仅在于工商业技能的培养，更在于培育能够承担国家现代化使命的公民个体。通过科学与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民众不仅获得谋生技能，还能够实践中形成责任感与认同感，从而凝聚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与集体意识的群体。这种凝聚力正是“合群”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因此，严复明确提出，实业教育是合群保种、提升民力、民智、民德的实现路径。他解释道“实业，西名谓之 Industries；而实业教育，则谓之 Technica Education。顾西人所谓实业，举凡民生勤动之事，靡所不赅；而独于树艺牧畜渔猎数者，则罕用其字。说见《社会通论》至所谓实业教育，所苞尤隘，大抵同于工业。”^⑩在他看来。“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育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已耳！”^⑪要解决当前的弊病，

^① 严复：《救亡决论》，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42页。

^② 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页。

^③ 严复：《〈法意〉按语》，王栻编：《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85页。

^④ 严复：《〈原富〉按语》，王栻编：《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00页。

^⑤ 穆勒：《群己权界论》，严复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69页。

^⑥ 严复：《救亡决论》，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3页。

^⑦ 严复：《原强》，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页。

^⑧ 严复：《原强》，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页。

^⑨ 严复：《〈原富〉按语》，王栻编：《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58页。

^⑩ 严复：《实业教育——侯官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说》，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3页。

^⑪ 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王栻编：《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页。

需要将教育、科学与生产结合起来，他指出“实业”正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实业”的核心是以科学为根本，将知识付诸于生产实践，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用以满足、增进国民生计和普遍福祉。他说：“大抵事由问学，Science，施于事功，展用筋力，于以生财成器，前民用而厚民生者，皆可谓之实业。”^①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今日自救之术，固当以实业教育为最急之务。何则？惟此乃有救贫之实功，而国之利源，乃有以日开，而人人有自食其力之能事。语曰既富方穀，又曰仓廩实而后知礼义，兵力教化，何一非富足而后可言乎！”^②与实业教育相关联的物理（自然科学）不仅是当前教育事业亟需，也对“增益智慧、变化心习”有很重要的作用。为此，严复强调要“转变吾人之心习，而挽救吾数千年学界之流弊者，非妄语矣。夫物理科学，其于开浚心灵，有淘炼特别心能之功既如此，而于增广知识，其关于卫生保种，大进实业又如彼，然则教育所用学科，宜以何科为当务之急。”^③

在提升民力方面，严复认为民力提升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与实践能力的结合。传统教育过于强调书本知识的传授与积累，却忽视了知识与实际生产的联系，导致社会无法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因此，他主张将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融入教育体系，培养能够掌握现代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劳动者。严复认为实业教育既注重对现代科学与技术的知识引用，又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劳动和实践经验的积累，“第须知实业教育，其扼要不在学堂，而在出堂后办事之阅历。以学堂所课授者，不过根柢之学，增广知识，为他日立事阶梯云耳。”^④这些直接关联国家的经济复兴和民族的强盛。他指出“实业之利国，其大者如矿、如路、如舟车、如冶、如织、如兵器，所共建者也。”^⑤所以，严复强调实业教育的目的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要培养民众的实践能力和生产能力，使其能在社会中发挥实质性作用，推动国家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发展。他说：

“言今日之教育，所以救国，而祛往日学界之弊者，诚莫如实业之有功。盖往日之教育笃古，实业之教育法今；往日之教育求逸，实业之教育习劳；往日之教育成分利之人，实业之教育充生利之民力。第须知实业教育，其扼要不在学堂，而在出堂后办事之阅历。”^⑥

在提升民智方面，严复认为开展实业教育的过程，不仅是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的过程，更是将科学方法与逻辑训练贯彻到国民智识结构的制度化实践。其根本目的，在于改造国民的思维方式和心智结构，使其摆脱空疏、玄虚的旧学束缚，转而形成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批判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现代新型国民。正如他所指出的“生人之事，以炼心积智为第一要义”。^⑦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培养能够自觉思考、理性判断并服务社会的公民。他特别强调现代科

^① 严复：《实业教育——侯官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说》，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3页。

^② 严复：《实业教育——侯官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说》，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4页。

^③ 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王栻编：《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4页。

^④ 《实业教育——侯官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说》，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6页。

^⑤ 《实业教育——侯官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说》，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8页。

^⑥ 严复：《实业教育——侯官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说》，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6页。

^⑦ 严复：《西学门径功用》，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3页。

学在思维与方法训练的优势,认为科学的普及不仅能带来技术进步,更能开启国民的理性精神。他曾在给长子严璩的书信中感慨“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后而后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①可见,在严复看来,实业教育是实现民智启蒙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正途。

此外,严复将实业教育与社会分工的建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提出人才培养应“治学治事人才宜分二途”,并批判传统教育导致“学业不修,政事不举,一一均由所学之非”,进而指出“治学之才与治事之才,恒不能相兼”,其中“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②这不仅反映了严复对不同类型人才功能分化的深刻洞察,也揭示了社会现代化所必需的知识分工逻辑。只有当实业教育兴盛、农工商之学人的数量多于入仕之学人时,民族国家才能够得到长远发展。由此,严复所构建的教育理路,既是对旧学传统的根本性批判,也是对民智提升的现实路径设计。通过科学方法与实业教育的结合,他试图从知识结构、人才培养与社会分工三个层面重塑国民心智与国家根基,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奠定基础。

在提升民德层面,实业教育强调勤勉劳动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这本身就是一种德性培养的过程。国民通过劳动生产活动,既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技能,又在共同合作中养成了责任感、纪律性和契约精神,进而为公德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实业教育重视群体协作与分工秩序,这种对集体利益和公共责任的内化要求,有助于突破传统社会中个体只顾一己安危的功利心态,转而形成关切整体、兼顾社会的价值取向。实业教育在严复看来也是对旧有八股教育流弊的矫正,后者往往导致士子脱离实际、追逐功名,从而滋生个人私利化、社会虚伪化的风气。^③通过推广实业教育,社会价值重心得以从虚文转向实用,从功名逐利转向服务社会,进而实现民德的整体提升。

四、余论

清末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境地,民族危机与国家转型的紧迫性前所未有。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严复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现实感,提出以“合群保种”为核心的教育救国理念。他深知,教育并非单纯的文化事业,而是关乎民族存亡和国家前途。正因为如此,严复将实业教育与国家竞争力、社会重建和个体发展紧密联系,为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深刻的思想资源。

首先,严复强调实业教育与国家竞争力的内在联系。他深受进化论思想影响,认为世界格局本质上是“群与群争,国与国争”。在这种竞争格局中,国家能否自立,取决于国民的体力、智力与德性。传统科举教育偏重八股文辞,导致学术与生产脱节,既无法造就实用人才,也难以应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对此,严复主张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使民众掌握现代科学与生产技能,推动社会财富积累与经济繁荣,从而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他认为国家要谈政治教化与文化重建,前提必须是经济的振兴和民生的改善。这种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教育观,可谓后来的“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现代教育理念奠定了思想先声。

其次,实业教育在严复思想中不仅关乎技术训练,更具有民智启蒙的功能。他批判八股教育“锢智慧、坏心术”,使国人因循守旧、缺乏创造力,最终导致社会停滞和民族衰落。实业教育则不同,它强调科学方法与实践能力的结合,要求学生在生产与社会实践中的锤炼理

^① 严复:《与长子严璩书》,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80页。

^② 严复:《论治学与治事宜分二途》,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页。

^③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5页。

性思维和逻辑能力。严复认为，科学教育能够开拓国民的心智结构，使他们形成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从而推动社会的整体理性化进程。这种重实学、重科学的思想，实际上把教育与现代知识体系、社会理性精神的养成紧密联系起来，展现了深刻的启蒙意义。

再次，严复高度重视实业教育在民德养成方面的作用。他指出，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之一在于民众缺乏公共精神，普遍陷入狭隘的个人功利主义之中，导致社会凝聚力不足。实业教育通过群体性的生产与技术训练，使个人认识到发展必须依赖合作与分工，从而在实践中养成责任感、纪律性与契约精神。严复强调，唯有通过这种基于劳动与合作的教育，才能逐渐形成社会的公共德性，克服个体之间的冷漠与对立，实现真正的“合群”。在这一点上，他已经超越了传统道德教化的思路，而是把道德提升与社会生产、经济生活紧密结合，赋予民德建设以新的现实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严复对教育现代化路径的探索，对后世仍具有深远启示。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教育必须从“学古入官”的旧路径中跳出，转向与科学、社会、生产密切结合的现代道路。他提出的“民力、民智、民德”三位一体的教育理路，既是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也是对现代教育的系统构想。从这一角度看，严复不仅仅是晚清的启蒙者，更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奠基人。

综上所述，严复的教育观念是晚清民族危机下的深刻反思与理论创新，其核心在于以实业教育为抓手，全面提升民力、民智与民德，从而实现“合群保种”的目标。虽然他的思想产生于一个多世纪之前，但其中关于教育与国家竞争力、教育与科学理性、教育与社会道德的关系等命题，仍然能够为今日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重要借鉴。严复以教育为起点的救国方案，既是对民族生存困境的回应，也是对现代教育本质的深刻洞见。

参考文献

- [1] 严复：《严复集》第1册，王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2] 严复：《严复集》第2册，王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3] 严复：《严复集》第3册，王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4] 严复：《严复集》第4册，王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5] 严复：《严复集》第5册，王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The educational view of Yan F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learning'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Yang L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01120)

Abstract: Yan Fu, a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hinker in modern China, rooted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deeply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national crisis and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learning', he proposed that 'collective unity and preserving the race' is the core essence of education for national salvation, emphasiz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cohesion through education to achieve the continu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 state and nation. He keenly observed that the root of China's weakness lay in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people's 'national strength', 'national wisdom', and 'national morality', and proposed an educational system centered around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 to comprehensively elevate the quality of the citizenry. In this system, industrial education was given a key position. Yan Fu believed that industrial education combines science and production to enhance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wealth, reshape the rational thinking and public spirit of the citizens, and ultimately realize 'enhanced citizen livelihood'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nation's race'. This thought not only addresses the crisi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also provides insights for today's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alent cultivation.

Keywords: Yan Fu; 'Group Studies'; Educational View;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作者简介:杨玲(1988-),女,讲师,社会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就职于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